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7) 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向宛平县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序幕从这里揭开。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吞并全中国的必然步骤。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这是它确立“大陆政策”之后，实现亡华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以东三省为基地，入侵华北，占领全中国。1933年，日本占领内蒙古东部，越过长城侵入华北，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控制了冀东。1935年5月，日本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7月，何应钦致函梅津，正式承认了所提各项要求，即通称《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政府从河北省及平津两市撤出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宪特武装。随后，日本又指使汉奸，占领冀东22县。1935年6月，日军再制造“张北事变”，规定察东为非武装区，赶走察省国民党部，取缔民众的抗日运动。

华北已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下一步开始侵入华中和华南地区了。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6年上半年，日本向华北大量增兵，驻华北的日军由原来的5000人增加到2.5万人以上，改天津驻屯军为华北驻屯军，并在天津设司令部，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同年5月，日军在古北口等处筑炮台，铁路沿线驻重兵，通州日军已达1000余人。9月，日军制造丰台事件，强占交通要道丰台车站。1937年上半年，日军从国内和东北抽调大批军用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日军的力量，并在平津一带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是：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五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二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二团第三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一团驻北平，其中第一团第三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第一四三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一、第二旅，独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独立骑兵第十三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辖第一九、第一一、第一一一旅和独立第二十五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一三二师赵登禹部辖第一、第二旅和独立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二十九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二十九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二十九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三营（步兵4连，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各1连，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一、第二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10余公里处，在宛平县城南端，是北平的重要门户。它联结平汉、北宁铁路，又为平保公路所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在日军已经控制着丰台等要地的形势下，一旦日军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切断，北平将进退失据，日军即可扼住北平的咽喉。所以，卢沟桥地区势必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深夜12时，北平市市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耳机里传来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严厉的声音：“今晚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宛平城内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1名，日军今夜要入城搜索！”一听卢沟桥三个字，秦德纯吃了一惊。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为营，六年中已经蚕食了华北北部广大地区，北平、天津也完全处于日寇包围之中。位于北平西南15公里、平汉线上的卢沟桥地区，已成为北平联系内地的唯一门户。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日本获得了在卢沟桥南的丰台铁路枢纽一带的驻军权，此时已集聚了8000名日军，随时可以切断北平与处界的联系。身为北平市长和驻军长官，秦德纯当然心中着急。他不敢贸然答应松井，但表示立即查明真相，再与日方共商解决办法。

其实所谓“一名日兵失踪”云云，完全是日方随意编造出来的。事实上，此时“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寇此举，不过是奉近卫内阁之命故意制造事端，为发动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制造借口罢了。

接着，松井又声称：中国方面如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请示上级，中国方面断然拒绝。日军立即调动丰台驻军，利用夜幕包围宛平城。

驻守在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是四年前喜峰口长城抗战的英雄。驻军卢沟桥一年多来，面对日寇的挑衅，何旅长坚持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很显然，随着“失踪日兵”案的出现，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7月7日晚，日军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就开枪开炮，攻打卢沟桥。守军当即还击。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它宣告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

争的开始。

7月8日晨，日军向宛平城开枪，炮轰卢沟桥。守卫卢沟桥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团长吉星文即向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报告，冯立即下达命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二一九团坚决执行冯治安的命令，英勇反击，从而拉开了威武壮烈的抗战序幕。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三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一营于大枣山附近待机，同时令第二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

战幕拉开后，日军一大队500余人携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中国守军阵地展开猛攻，妄图一举攻占宛平城和卢沟桥，日军先是向宛平城内开枪并以迫击炮攻城，威胁中国守军退出宛平城及卢沟桥。中国守军则坚守城门，予以还击，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攻城受挫后，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凭借优势的武器装备，猛攻卢沟桥和龙王庙等处。卢沟桥桥头阵地的中国守军不足一连，在两中队日军轮番攻击下，蒙受重大牺牲。中国守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不利形势下，不畏凶恶，奋勇拚杀。他们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杀退敌军的反扑，打毁敌军坦克，用大刀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予敌以重大杀伤，狠狠打击侵略者。铁路桥、龙王庙被日军占领后，由长辛店驰援的二一九团第二营，从永定河西岸立即发起反攻，把日军逐出阵地，夺回了卢沟桥。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向桥头猛攻，占领了铁路桥。敌我双方在卢沟桥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这天下大雨，永定河水汹涌澎湃。宛平城下，卢沟桥畔，成了敌我双方拼搏的战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军迅速占领宛平城的企图，但由于龙王庙和铁路桥被日军占领，对中国守军造成了很大威胁。

为了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这天傍晚，何基沣率领全旅官兵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日军反攻。夜12时，二一九团突击队紧握红缨大刀和手榴弹，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展开了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战斗，“他们齐声高呼，举刀砍杀，日军猝不及防，忙用刺刀抵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凶狠的日军无法抵挡中国士兵为正义而战的英雄气概和寒光闪闪的大刀。转眼间，日军被砍杀30余人。……战斗一直进行到9日凌晨，侵占桥头的一中队日军几乎全部被歼，在卢沟桥车站指挥作战的日军旅团长河边，也险被生擒。”二十九军的夜袭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举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7月8日这一天，卢沟桥“历经三失三得，仍然由我军固守。”我军“官兵伤亡38名，三营营长金振中负伤。日军被打死70多人，大队长一木清直被当场击毙。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在卢沟桥的英勇抗战，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伟大气势。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和坚决回击，是出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的。日本侵略军曾口出狂言，说3个小时占领宛平，三天打下平津，但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之后，见势不妙，乃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冀察当局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7月9日上午，双方商定停战办法三项：“（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城内防务除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但日军并未遵

约，始终赖在当地不退，仍不时炮击县城及附近地区，军民伤亡很多。由此，双方又于10日上午再次进行撤兵谈判。但在谈判中，日方代表樱井等四人忽然逃席而去。10日以后，日军又发动新的进攻，并搁置已达成三项协议，再提出新的条件，逼迫冀察当局屈服。

7月10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停战撤军的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果，于7月11日达成《卢沟桥事件协定》：“（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但就在中日双方达成了上述协议的当晚，日军乘中国守军将要撤退之时，再次向卢沟桥发起攻击。指挥作战的第三营长金振中被日军炮弹炸伤大腿，鲜血直流，仍不肯退下去包扎，高呼“军人守上有责，不能临阵退却。”激战中，不少士兵负伤，仍不愿离开战场。他们宁愿在火线上战死，也不愿去后方偷生。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二十九军抗战。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一定要守住宛平城，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企图使事件早日和平解决。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列强在华北都有利益，它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了却是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

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 (1) 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 (2)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 (3)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 (4)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的爱国群众纷纷动员起来，共赴国难。长辛店工人迅速行动起来。7月8日，他们就搜集了大批铁轨、枕木、麻袋等，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宛平前线建筑防御工事。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草、出柴、出工支援二十九军：年老的当向导；青壮年抬担架，挖战壕、修路、运弹药；妇女们蒸馒头、烙饼、烧开水；连七八岁的小孩也端着水盆供二十九军士兵磨刀。北平各社会团体派出代表赴前线慰问，并组织宣传队、看护队、战地服务团等，广泛地进行支前活动，义勇队还参加了实际战斗，形成一股军民抗战的洪流。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上海筹组妇女界拨助抗战的团体。红军总司令朱德国表示为抗日救国，“愿意放弃10年来有着光荣声誉的红军这个名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实现全国一致的对日作战。”不少国民党将领通电要求开赴前线，海外华侨团体电请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李宗仁、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愿意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卢沟桥抗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加速了中国内部的团结统一，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在举国一致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11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出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族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同一天，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

准备在二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针对日本日益紧迫的军事布署，中国方面也在行动。在此之前，为加强卢沟桥前线中国守军的兵力，并给日本侵略者以更有力的惩罚，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7月9日把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一部调到长辛店一带。冯治安、何基沣商定，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机，出敌不意，于10日夜间袭击丰台日军，予以歼灭性打击。但9日晚，二十九军主和将领给何旅打电话阻止，并以军部名义严令何部“只许抵抗，不许出击。”何旅接到军部命令后，原定袭击丰台日军的计划未能实行。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愤慨地指出：“11日拂晓，我已下达了进攻丰台的命令，全军磨拳擦掌，准备一鼓作气歼灭我们的仇敌。可惜上级来了一道命令，说撤兵办法已商妥，不得妄自进攻。——旅的全体将士没有一个不悲愤到了极点，这个可贵的时机又白白放过了。”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其他方面一样，完全陷于被动。

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增兵、扩大战争面前，蒋介石、宋哲元等在抗战问题上动摇不定。7月12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军政当局最高领导人宋哲元，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并指示宋哲元与日方谈判，谋得事变之和平解决。宋则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地位，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他违背二十九军广大将士的抗战意愿，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而在军事上却未采取应有的部署。

7月11日，宋哲元去天津日军司令部谋求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行前他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宋赴津时，中日双方已达成《卢沟桥事件协定》，形势似已趋向和缓。于是，宋就在祈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7月12日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

但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因签订协定而停止，继续不断地发动局部攻击，并向冀察当局提出种种条件，又逼迫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屈服。7月13日，日军又提出七个条件，其中包括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北平城内不得驻屯冯治安三十七师等。接着，7月15日，日本政府陆军首脑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中国驻屯军作战计划》，要求华北驻屯军“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迅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7月16日，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增调10万陆军来华。

尽管如此。此时南京政府仍未最后决定是战还是和。蒋对宋应如何抗战，对于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应如何与二十九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一字未提。由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抗战与妥协之间动摇，犹豫不决，这就直接影响着二十九军的抗战决心。

这时，宋哲元继续向侵略者乞求和平。7月18日，宋偕张自忠赴天津拜访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次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达成了《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排日的具体方法协定》。19日，宋由天津回北平，即刻下令撤除巷战防御工事并取消一切戒严措施。20日，宋又发表主张和平的书面谈话，谓“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已有可能，又通电谢绝各方汇来抗战劳军捐款。宋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尽量制造缓和的气氛，但平津战争却在急剧地恶比着。

7月20日，二十九军军部按照中日双方已达成之停战撤军协定，强令三



十七师撤出卢沟桥一带，驻守在卢沟桥畔的爱国官兵坚决拒绝撤出阵地。日军见二十七师不退出阵地，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日军炮火炸平了桥畔田园民房，闻名中外的卢沟桥，也被炸得残缺不全。守军连续击退日军四次冲锋，杀伤敌人 200 余名。”

21 日清晨，二十九军军部再次向卢沟桥守军下达“立即撤兵”严令。谁愿意放弃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阵地啊！许多士兵扑倒在沙袋上失声痛哭。在上级军官的严励督促下，守桥士兵只得含泪撤出固守了 13 天的阵地，把防守卢沟桥的重担交给了地方保安队。

当宋哲元和冀察当局加紧谋求同日军妥协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于 7 月 23 日又发出宣言，反对宋哲元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屈辱条件，并提出八项办法，要求制止宋哲元与冀察当局的妥协活动。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一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十一旅进抵高丽营；第二十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 月 25 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二十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 16 时 30 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二十师第七十七团和驻屯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 26 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 日下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军于 28 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二团第二营，分乘 26 辆卡车于 19 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 22 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 27 日命令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五、第六、第十师和第十一师、第三师共五个师约 20 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睫。26 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接命令孙连仲随时加入。”

7 月 25 日，日军援兵调齐之后，以飞机几十架和猛烈的炮火向廊坊中国驻军轰炸，攻占了廊坊，切断了平津间的联系。此时侵华日军已增至 10 万人以上，飞机 200 架，坦克 100 余辆。日军已占明显优势，且对平津形成三面包围态势。27 日，日军出动陆空军，向南苑、北苑进攻，并于当天上午在以军事进攻的压力下，限冯治安三十七师于 28 日正午以前自北平及其附近退尽。

7 月 17 日下午，宋哲元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随即发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的自卫守土通电，历数“七·七”以来日军的侵略罪行，下令所属各部抗击日军。但已经为时过晚，贻误了战机。此时，北平四郊的战事均已爆发。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 26 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 27 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二十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

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一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二十师三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二十九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三十七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一四三师向南口出击，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正在接防的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二十九军作战。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二十九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稳守三天，援军正在向北平进发。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28日凌晨2时，日本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二十九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

7月28日，日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有第三十八师、骑九师和军特务旅共五个团（含1个骑兵团），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一、第二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二十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终于失守。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和第十一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奋力抵抗。第三十七师和第三十八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三十九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也阵前倒戈，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北平去保定。第三十七师等部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完全沦陷。

在这之前，为了配合北平保卫战，卢沟桥守军在何基沣等将领的率领下，向丰台的日军发起主动攻击。他们巧妙地把日军引出阵地，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最后夺回了丰台车站。但是，局部的胜利已经无法挽回整个战局的失败。北平失守后，固守卢沟桥已没有战略意义。7月30日夜，第二十九军残部忍着悲愤撤出卢沟桥。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

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二十九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等一二旅和第二十六旅等部。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三十八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三十八师第二十六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10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二十师的四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的反击下，李文田指挥部队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在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二十九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援军又未及时赶到，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与宋哲元无关，愿由我一人负责。”但是，蒋介石一个人怎么能负担得了丧师失土的失败责任呢？

##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后，即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右路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进逼南京；左路沿太湖南侧迂回，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当时，国民党军在上海、南京之间曾筑有两道防线。此外，在镇江以西阵地还筑有许多工事和堡垒。国民党当局不发动群众抗战，曾幻想依靠这些防线和工事便可阻挡敌人的进攻。但是，自11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进行侧背迂回时，上海守军不得不向吴淞线阵地撤退，脚跟还没有站稳，跟踪追击的敌人已经逼近，只好继续撤退。这时，日军接连攻陷常熟、苏州、嘉兴和吴江，第一道防线崩溃。接着，中路敌军又自郎溪北犯，连陷溧水、句容、秣陵关，直扑南京背后；左路敌军，自长兴绕道宣城，直扑芜湖、当涂。11月28日，国民党军队慌忙再由江阴、无锡撤退。第二道防线也丝毫未能起到阻止敌人的作用。

两道防线均被突破，三路敌军兵临城下，南京外围守军已退入狭窄的阵地，城内官兵乱作一团。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就暴露在日军的面前。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讨论南京防守问题。应召到会的高级将领有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参加了会议。

从当时局势来看，坚守南京已无军事上的意义：上海、杭州湾失守后，南京已失去屏障，日寇正日夜兼程，兵分两路包抄南京；从战术上讲，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受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中的惨败，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难以坚守；日寇在上海刚刚取得胜利，士气正旺；夺取中国首都，对于日本军人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必然冒死去争功。所以坚守南京，不仅会再次使中国军队遭到打击，作为六朝古都，南京灿烂的古代文明还可能遭到破坏，平民也可能遭到无辜杀害。

会上大多数将领认为：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但南京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影响不利。因此，主张只留12个至多18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适当抵抗即撤退、是为上策。白崇禧等表示支持。蒋介石本人对此极为矛盾：打，必然一败涂地；逃走又难以承受舆论谴责。这位在上海滩黑社会混过的政治家，仅仅原则地说：南京为国府和国父孙中山陵墓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我个人是主张死守的。对于大多数将领主张放弃的意见，唐生智却独持异议，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国际上影响重大，又是孙（中山）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并表示愿意勉为其难，一定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见唐生智如此慷慨激昂，如果自己坚持放弃南京，将来必然会被别人抓住把柄，于是顺水推舟说：那就请老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吧。唐生智毫不犹豫，慨然允诺，发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放弃还是死守南京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就这样轻率地决定了。

蒋介石一面表示要帮助唐生智固守南京，一面却将其嫡系部队主力向皖南撤退，并下令迁都重庆；同时，开始与德国大使陶德曼密谈，积极作降日的准备。

12月3日，日军逼近南京，双方开始零星战斗。9日，日寇开始大举攻城。此时，那位“誓与南京共存亡”，准备“牺牲”的唐生智却让人在浦口

车站预备专车，准备乘车北去。三军统帅如此态度，那战况就可想而知了。15万南京守城部队激战三四天便全军溃退，唐生智仓皇乘车北逃徐州。南京军中无主，一时大乱，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以至自相残杀，死伤无数。

12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攻击南京命令；9日，围攻南京的日军向城下逼进。当晚，城郊老虎洞、体育场、马群、孝陵卫一带高地被敌占领，守军纷纷溃退。

12月10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谷寿夫所部第6师团及第3、第5、第9、第13、第16、第18、第114师团等部，对南京城阵地猛烈攻击。当日下午，敌军一部突入光华门外城；11日，全线展开激战；12日，敌猛攻中华门外重要据点雨花台，守军第88师伤亡惨重，至中午雨花台陷落。敌第6师所部首先突破了中华门附近的一段城墙，向城内突入。敌军占领雨花台后，以猛烈炮火向中华门阵地及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处轰击，许多建筑物被轰毁，震裂声响彻全城，并有数处起火，黑烟冲天。

12日下午5时，战事紧急，唐生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下达撤退命令。撤退的命令一下，国民党10余万军队争相逃命。数万大军和大批居民涌向下关等渡口，上有敌机扫射，下有敌军追堵射击，官兵自相践踏，交通阻塞，混乱不堪，死伤狼藉，惨不忍睹。一时尚未接到命令的部队，有的被日军歼灭，有的化装逃到国际难民区；88师师长孙元良，竟脱掉国民党军装，换上便服，躲到一家妓院拜鸨母作干妈后，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才跟着被疏散的难民溜了出来。12月13日，南京陷落。

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多是遇敌即溃，国民党官更多是弃职而逃。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轻视民众的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的必然结果，就只有节节溃败了。

南京沦陷后，大批的日本侵略军象一群凶猛的野兽，闯进这座文明的古都。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野蛮大屠杀开始了。

12月13日，日军入城。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浦口。第16师团一部进入下关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并乘舰艇向江面上尚在用船只、木排渡江的中国军人射击。中国军队被敌枪炮打死及淹死者多达三四千人。中国守城部队渡过江去的仅有第36师一部及教导总队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困在城中，不久都牺牲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日本侵略军谷寿夫所率领的第6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同谷寿夫第6师团合攻南京城的还有中岛第16师团、牛岛第18师团、末松第114师团，共4个师团。统率这4个师团攻占南京城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当战事紧张时，南京的百万市民曾开始向外地疏散。但广大居民无力远走，除有20万左右的市民流落城外四乡暂避，有25万多市民躲进外侨划设的国际难民区，大部居民只好留在家中。另有大量从前方溃散下来的伤、病散兵和难民，拥入南京城，聚集在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一带。这数十万无辜军民，便成了日本兽军任意屠杀的对象。

当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和外地逃来的难民大部分已避入“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11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该委员会向中日双方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中国方面

对之完全承认，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将区内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进入南京城以前也保证：如果难民区内真地没有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 29 万人，另有几千名中国军人到国际委员会缴枪，要求保护。委员会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允许进入安全区。

由于安全区人满为患，一部分难民和伤病士兵便涌向江边，希望渡江。通往下关码头的中山北路和通往燕子矶的中央路上挤满了人群，城破之后他们就成为大屠杀的首批牺牲品。13 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 6 师团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战斗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成堆。

14 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日军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杀向江边。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并投掷手榴弹，短时间内就将数万人的生命断送。并且日军还对城内成年男子进行有组织的屠杀。15 日，中国平民及俘虏 9000 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雨花台、水西门外、上元门、和记公司等处都是日军集中杀人的屠场。躲入“安全区”的百姓也毫无安全可言。日军丝毫不讲信义，对集中在这里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16 日，从安全区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推入江中，鲜血把江水染得赤红。同日，华侨招待所难民 5000 余人也被押往下关中山码头枪杀。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大部分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军人在向日军投降之后惨遭杀害。好些中国士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的 72 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枪扫射而集体地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 3 万人以上。

谷寿夫所部进城后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杀；见到中国女人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从中华门附近的居民区，到中央路和中山北路的难民区，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遍地展开，六代豪华的文明古都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大批日军在南京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两天之后，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积尸成垒，变成了血路、血窟。同时，日军大肆抢掠焚烧，先劫取仓库、公司存货，然后纵火焚烧，使繁华市区顿成灰烬。兽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杀戮妇女儿童，连 8 岁的女孩和 70 多岁的老妇都未能幸免。日寇还借口难民区藏有两万中国士兵，将青壮年难民分批抓走，用绳索捆绑，每一百或数百人结成一串，押至江边，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

环城和城外沿江一带的残杀更为凶狠。自 12 日下午起，日军在紫金山活埋难民 3000 人，在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 2 万余人。躲藏在和记制蛋厂内的成万难民，尽被杀戮。上元门、凤凰街上新河等处，被杀戮的从前方俘虏来的兵民达两万余人。汉西门外一次就有 7000 多名难民和已被解除武装的军警被活活烧死；日军竟群立两旁，看着一片摇曳的火光，听着凄惨的叫骂声，狂笑取乐。随后，又用数 10 辆大卡车载千余老幼男女到沙洲，掘一大坑，尽数活埋。

有一部分日军赶到燕子矶，对着正在通过八卦洲渡江的 10 余万军民，用机枪狂扫滥射，顿时，尸体满江，江水被染得通红。余存者都被围于沙滩，用数十挺机枪尽行射死。下关、中山码头聚集着待渡的伤兵、军人家属及难民万余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息尚存者，竟被驱进江心淹死。日军又从

沿江难民村搜捆难民 5.7 万名，其中大多为伤兵和散兵，被驱赶到草鞋峡，用机枪扫射；中国士兵高喊“夺枪”，欲与日军拚搏，直至全部被射死。

12 月 17 日，松井石根入城，举行所谓“胜利入城式”，实则布置第二步大屠杀。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踏着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尸体血迹入城，并对入城后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厉害的第 6 师团长谷寿夫大加奖励。于是屠杀暴行愈演愈烈。

当时，城内商店、公司、居民因恐怖而闭门躲避；松井遂以有意抗拒的罪名，强令居民敞开门户，以示欢迎。于是，日军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射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甚至因搜查不出妇女或钱财，而将全家杀害。一天之间，被杀者数以千计。

日寇对南京军民的屠杀是灭绝人性的。他们或者随意从商店拉出一青年，脱光衣服，用硝镪水浇，使浑身焦烂，再逼令行走，直到倒毙，以此取乐；或者剥去被俘士兵的衣服，捆在柱子上、门上，用锥子把他们刺成血人，对叫骂怒视者，再猛锥眼睛，随后用刺刀把喉咙穿破；或者把成百士兵绑起，挖出眼睛，割去耳朵，放火烧死；或者轮奸一孕妇后，又剖出腹中胎儿，挑在刺刀上戏耍；至于把人捆在电线杆上或树杈上作为枪击和刀刺的靶子，更是常有的事。只有 300 来户人家的王府巷，被日寇多次血洗。见到走路的人他们就捉住乱刺，割下头、有许多人家被全部杀死。几天之内，王府巷被杀害的居民就有 500 多人。

对于那些被认为有抗日嫌疑的人马上绑走，押至城郊五台山烧死。如此狂暴屠杀的“清街运动”，一直持续到 1938 年 1 月上旬；此后，零星残杀仍继续不止。

日军杀人的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幼女丁小姑娘，经兽军 13 名轮奸后，因不堪蹂躏，厉声呼救，当即被刺穿小腹致死。市民姚某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经兽军奸杀后，8 岁幼儿及 3 岁幼女因在旁哀泣，均被兽军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

哪怕是和尚尼姑也难免惨遭杀害，如著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等都是日寇进城的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莫愁湖和三条巷的池塘的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城南一带，有的巷口尸首堆成了一人多高的尸山，所有的防空洞也填满了男男女女的尸身。

日寇兽行中最残暴和令人发指的，还有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竞赛”。敌片桐支队两个少尉：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岩，在长官的鼓励下，彼此相约作“杀人竞赛”，决定在侵占南京前，谁先杀满 100 人，谁便夺取锦标。到了汤山向井杀死 89 人，野田杀死 78 人，“竞赛”还不能结束。这种野蛮屠杀事件，竟在大阪的《每日新闻》、东京的《日日新闻》和英文版的《日本广宣报》等报刊上大肆宣扬，叫嚣要保持“武士道精神”。这两只野兽在得到“表扬”之后，决定在南京城内继续“竞赛”，杀人的方法是用刀劈。于是，他们分头走入大街小巷，以极其锋利的钢刀，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达到了 100 的时候，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在这之后，其中的一名又

添杀了 35 个中国人，另一名添杀了 36 个。但是，谁先杀满 100 人，则不能证明。于是这两个法西斯刽子手准备再以 150 人为标准，或以千人为标准进行“竞赛”，看兴趣再定。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被披露之后，日本政府、大本营和日军司令长官，不但不给予任何制止，反大肆赞扬其耀扬国威的“光荣”事迹；东京《日日新闻》还刊登照片，称“两皇军正继续努力杀人”，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兽军的本质。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他们三五成群，挨门逐户搜索居民住宅，无论金银、衣服、家具、车辆，一概是日军抢劫的对象，甚至剥去八十岁老妇身上的衣服。日军还闯入安全区，把难民身上仅有的一点财物全部夺去。任何人只要稍加抗拒即被杀害。12 月 13 日，一个瞎眼理发匠携孩子在南京行走，遇日军向他索钱，因为没有钱，日军就朝他的胸部射击。12 月 20 日，日军向南京某帽庄的主人索钱，他罄其所有，交给日军后，日军觉得不够，继续勒索，他无法拿出这么多钱财，便遭枪击。同日，日军闯入金陵大学红十字会施粥厂向会计员勒索法币 7 元而去。日军抢劫金陵大学的教授住宅，共达 5 次之多，虽然这些住宅既悬美国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可见“国际安全区”也并不安全了。这里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他的住宅被日军“光顾”三次之多，每次都抢些值钱的东西走。还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扒走他仅有的 60 元纸币。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城内黑烟四起，中华门、夫子庙、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珠江路等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人口稠密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凄凉的死城、地狱。遇坚固建筑不好点燃，就利用化学药品助燃。无数栋高大的建筑，都屋塌墙翻，化为一片焦土。由中华门起沿中华路向北走，每隔两三家即有一大堆瓦砾堆，沿街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而中华门外的东西街长巷，烧得更加厉害，六七百户人家，片户无存。虽然日军进南京没受到任何军事上的阻力，但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都被焚毁，瓦砾成山。

上述种种兽性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近两个月内，几乎每日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上千件。日本军部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一项秘密命令中，承认：“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密令并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强奸中国妇女后，最好将她们杀掉。可见日本侵略军的上述罪行，完全是得到日本军国主义高级机关的默许和纵容的。

对日军的种种暴行，就是当时的国际舆论也纷纷进行了谴责。《字林西报》曾写道：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还在继续，中国人并没有可以引起日本人施行报复的行动，他们一点罪过也没有。连法西斯德国的代表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指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身临其境的外侨，说得更为具体：“凡是可能想象的任何罪恶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一一实行。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

日军在南京残酷虐杀俘虏和居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的暴行失却了起码的人道，严重违反了国际战争公约。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日军对南



京人民欠下了一笔血债。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写出了长达1218页的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南京市象被捕获的饵食似地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象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得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遍地都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日军“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在国际法庭的审讯中，还揭露了日军在国际难民收容委员会所设“国际安全区”内，同样烧杀淫掠的大量罪恶事实。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还认定：“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日本侵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南京市民，特别是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12月15日，是占领的第3天，有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3000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负伤未死的人也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同月16日，是占领的第四天，聚集在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5000多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这5000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梁廷芳曾被邀出席国际法庭作证。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是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是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6天。夜晚，日军将男女老幼共57418人，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在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乱刀砍戮。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是为了灭迹。有一个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逃了出来。也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根据国际法庭的调查和各种材料，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约在40万左右；至于被强奸、蹂躏、残害致伤的人数，以及被抢劫的财物、烧毁的建筑物等等，则更难以数计。这种种残酷的罪行，为现代战争中所仅见，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本质。这个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永远保留在历史上，不是日本少数人可以抹杀掉的。

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全部罪行中的一个突出例证。日寇侵入中国14年间，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平，不论在沦陷区，还是游击区，凡是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他们甚至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动物，到处制造“万人坑”、“无人区”，等等，其手段之残暴凶狠，面目之狰狞无耻，罪行之骇人听闻，实为人类有史以来所罕见。这种野蛮屠杀和残暴蹂躏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

日本法西斯强盗妄想用种种残暴手段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然而，它只能唤起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以强大的人民战争将其彻底埋葬，并作为留给中华民族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反面教材。

抗战胜利以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南京失陷后，唐生智逃往徐州，在列车上见到了力主放弃南京而在郊野决战的李宗仁。唐生智神情极为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南京开会时神情激昂的样子判若两人。唐生智说：“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料，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李宗仁劝慰一番，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从此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红军战士无比顽强的意志，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胜利会师陕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时期。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1933年初，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新的尖锐的阶段”。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红军主力与敌人在广昌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完全处于被动，穷于应付，以致军队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

但是，即使在这样危急关头，他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1936年10月，突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的，即仓促转移。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前，1934年7月，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年1月，红军在和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余部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到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8月，任弼时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月12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0月20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西征。

1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等共86万余人，于16日至21日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开始长征的时候，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湖边境向西转移。全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行动迟缓，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任命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何健为追剿总司令，调集大批兵力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路，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

得以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 12 月占领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 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此红军改向遵义进发，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12 月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现为草塘）。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打过乌江去，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会后，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于 1 月 7 日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黔北后，敌人继续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说服和耐心帮助，也开始觉悟，转变立场，同意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党和红军正确领导。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 年 1 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 12 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开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会上，其他同志多数作了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经过 3 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指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这一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中共党支部中去讨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基本原则。根据新的情况，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迷雾，重见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并乘敌人合围之前，于1月19日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计划由泸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或从宜宾上游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在川西创造新苏区的计划。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急取四川赤化”。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中央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示其向西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发展很快，但是因为敌人阻断了交通，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一个师的兵力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军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全被我军歼灭。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主动找敌人作战。敌人却小心防守。3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

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围剿。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泽东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120里。途中，连克定番、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4月下旬，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5个团的围追，另两路是红军主力，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这时，蒋介石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平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7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处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平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3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平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蒋介石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人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平渡7只小船，经过9天9夜全部渡过江去。第2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5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革命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对受蒋介石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17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

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了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1935年6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4个团，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6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懋功一带，与一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这时，川西北的敌军兵力薄弱，故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使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到来。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为此，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可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而提出了西进青海和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于6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向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毛泽东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1933年1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进。右路军由中央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座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1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9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军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城。10月，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4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旗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才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卓木碉、他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红军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座，再次过雪山草地，8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拖住胡宗南。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了。

但张国焘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

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过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红军从1934年10月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走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二万五千华里，终于摆脱困境，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一页。正像毛泽东后来说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向人们表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

红军长征结束，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地区，接近了抗日前线。这对于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才取得胜利的。

长征的全过程告诉我们，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般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 血战台儿庄

台儿庄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山东省南部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作战地区包括以台儿庄为中心的整个鲁南地区，故又称鲁南会战。

这次战役从1938年3月14日至4月15日，历时33天。日军方面，先后投入了其华北方面军所属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的主力部队，其中包括三个炮兵联队及部分空军和装甲部队，总兵力约4万人。中国军队方面，先后投入台儿庄会战的部队，总兵力约20万人。

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底，平、津、沪、宁相继失陷之后，日军侵华战争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是在于攻取陇海、津浦两路的中心点——徐州。

徐州是津浦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不仅北可威胁济南，南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了郑州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侧背。日军则企图使南北兵力在徐州会合，并沿陇海路西进，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直扑平汉铁路，消灭郑州、武汉间的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攻占武汉。

南京陷落，日本举国游行庆祝。日本舆论认为，中国首都沦陷，占领全中国指日可待，对华战争即将结束；侵华的日军将领更是气焰万丈，狂妄冒进，都急于要在战争结束前“建功立业”。

号称：“大日本皇军精华”的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更是抱着“先入关者为王”的心情，一路沿津浦线南下，一路从青岛向西挺进，妄图在鲁南军事重镇台儿庄会师，配合从南京沿津浦线北上的第三路日军一举打通交通动脉津浦线，夺取头功。

1937年10月，为了控制徐州周围地区，国民党军事当局设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驻徐州。战区辖山东全省及苏北、皖北地区。此时，日军已占领德州，山东即暴露在日军面前。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不仅带兵骁勇善战，而且为人宽和精明，颇有民主声望，在国民党杂牌部队中很有威信。在台儿庄战役中，各杂牌部队都愿意服从他的指挥。

第五战区在山东省驻守的有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五十五军，还有原东北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其中山东军主力驻守黄河沿岸、于学忠军驻青岛。在江苏驻防的有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韩德勤第八十九军。在江苏砀山驻防的有从河北前线撤下来的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随后，从上海撤下来的桂军刘士毅的第三十一军驻苏北海州。此时，第五战区主力部队不过7个军14个师共七八万人，大部分都是所谓“杂牌军”。

五战区长官部制订了保卫徐州的作战计划，其要旨是利用黄河和淮河，对日军的攻势分别加以遏制。

1937年底，日军占领浦口和济南后，开始由津浦路南北段合攻徐州。由于战局的变化和兵力不足，日军在津浦线上不得不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在南面，国民党军同日军对峙于淮河一线。日军在津浦路南段受挫后，遂调转头来，南守北进，增兵津浦北段，猛烈南犯。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所属矶谷师团于青城、济阳间渡黄河南下。翌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使日军轻易地占领济南、博山、肥城、泰安、兖州、曲阜、邹县，前锋攻到两下店。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将韩复榘逮捕，押至汉口，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为由，将韩处决，并任命孙桐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

1月1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坂垣师团主力也自上海调来，在青岛登陆。随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进攻临沂，与津浦路北段的矶谷师团取得呼应，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齐头猛进。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左翼也进击济宁，造成日军从左中右三路突击陇海，并策应津浦路南段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针对日军企图三路突击陇海的攻势，第五战区指挥部在鲁南战场上，组织了三路反攻。

右路：为了抗御日军向临沂的进攻，第五战区原驻海州的庞炳勋部兼程北上驻守临沂。

左路：2月17日，日军矶谷师团自济宁渡过运河向西进攻，2月下旬占领嘉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主力与矶谷师团一部在金乡、巨野一带相持一个月，使矶谷师团被牵制在济宁一线，无法向南增援津浦线。

中路：在津浦线正面的中国守军是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这个集团军兵力只有1万多人，装备很差。2月中旬，孙震部向日军发起进攻，包围了两下店。日军增援部队南下后，在峰山、邹县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1日，张自忠第五十九军调至滕县一带，增援第二十二集团军。不久，因临沂战局紧张，又将第五十九军调往临沂。孙震部与南犯之日军在界河、两下店一带相持一个月，打乱了日军的南下计划。3月中旬，邹县日军继续有增加，展开了新的攻势。至此，台儿庄战役正式开始。

台儿庄会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3月14日至3月20日，为滕县战斗和临沂大捷；第二阶段自3月21日到4月4日，为台儿庄保卫战；第三阶段自4月5日至4月15日，为全面反攻作战。

南路日军于1937年12月下旬渡江，攻占六合，并沿津浦路上，至第二年1月下旬，连陷滁县、明光、地河、藕塘一线，抵达池河东岸。第十一集团军刘士毅的第三十一军在池河西岸布防。从1月25日开始，日军利用飞机、大炮的掩护，冒雪强渡池河。该日黄昏，日军4000余人，炮30余门强行渡过池河，并向西攻击，连陷第一三五师梁山、五里墩、燃灯寺阵地。池河镇日军3000余人，坦克10余辆，突破池河后，连占桑家涧、红心铺，第一三八师退向定远。同日，三河集、马家岗之敌各千余亦攻占中国军队阵地。2月1日至4日，日军先后攻陷蚌埠、定远、怀远、临淮关、凤阳，并开始强渡淮河。

2月8日晚，蚌埠日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乘坐橡皮艇、帆布艇、木筏渡河，朝小蚌埠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阵地进攻，但被中国守军全歼。9日，日军600余再行强渡，中国守军阻截不住，退至小蚌埠以北阵地。10日，临淮关之敌由晏公庙渡过淮河，于学忠军的第一一四师在前板子、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终于失守，中国军队伤亡2000余人。12日，于学忠军分向浍河、懈河北岸和沫河口之线退却。13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抵达淮河流域，部署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五十一军战斗。

2月11日，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五个营围攻上窑，日军利用市街及炮

楼、围墙抵抗，刘军冲入圩内与敌肉搏，敌 300 余人向考城逃窜，外窑的日军被歼 100 余人，突围的日军据上窑顽抗。12 日，第一三五师一部克复武店、考城，并在考城附近将由上窑逃窜之敌大部歼灭。同时，第一三一师四个营联合当地红枪会，在凤阳、怀远一带实施游击，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从 16 日开始，国民党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入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 6000 余人增援考城、上窑、池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第五十九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丢弃阵地退向曹老集，我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因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南路受阻，其南北夹击的计划无法实现。

北路日军左翼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该股日军主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从东路包抄徐州。2 月 21 日，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率三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骑兵大队，辎重、工兵部队以及刘桂堂伪军共约 2 万人，向临沂突进，沿途遭到庞炳勋的第三军团、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以及保安队、游击队的节节抵抗。日军连陷诸城、莒县、沂水，于 3 月 5 日到达临沂以北，距城仅 10 余里。10 日，日军约八九千人，在战车 20 余辆、大炮 30 余门、飞机 10 余架掩护下，向临沂猛攻。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军团。

庞炳勋年过花甲，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军人，在 20 多年内战中南征北战，以善于保存实力的“滑头”著称。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庞炳勋不再疼惜“血本”，带着自己五个团的“子弟兵”与日寇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展开激战。板垣征四郎是日寇名将，九·一八事变就是他的“杰作”。但是这一次，日寇日夜反复冲杀，伤亡狼藉，竟不能攻下临沂。

以“精锐师团”败在中国“杂牌部队”手下，板垣面子上上下下不来，便亲自督战攻城，炮火十分猛烈。庞炳勋所部虽号称“军团”，实际上只有五个团装备不良的人马，渐渐感到不支，连向李宗仁告急。李宗仁又急忙调张自忠将军的五十九军援救沂。

调张自忠援庞炳勋，李宗仁真是因无兵力可调，出于无奈才决定的。因为张、庞原为战友，一次庞炳勋突然倒戈，从背后袭击张自忠，张差点被杀，二人因此结下很深的宿怨。但现在国难当头，张自忠向李宗仁保证，决不因个人恩怨影响抗日大局，坚决听从李宗仁指挥。

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从滕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也亲赴临沂指挥。

张自忠军于 12 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14 日拂晓奉命以主力分由船流、钓鱼台、前安静村、小姜庄附近强渡沂河，向白塔、沙岭、徐太平、亭子头方向攻击前进。第一八师在亭子头遭到一股日军的顽强抵抗。第三十八师一部攻克白塔、汤佛崖，但由于日军 600 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拼命反击，该师被迫退回沂河西岸。同时，庞炳勋第四十军亦从正面向日军反攻，其右翼占领相公庄，并向青墩寺、尤家庄一带进攻。15 日，该军攻克了东西沙庄、郑家寨、黄家墩、柳行头以南之线，并派骑兵从右翼迂回贾家庄、汤头一线。同日，刘振三第一八师攻下亭子头，日军向东、西水湖崖撤退；黄维纲第三十八师再渡沂河，占领沙岭。下午，日军猖狂反攻，步兵 1000 余人跟在数十辆战车后面由郭太平向我军阵地猛冲，守军沉着应

战，并派部队实施侧击，敌向左家官庄退去。于此同时，另一股日军 800 余人，炮 10 余门，在飞机掩护下，强渡沂河，企图截断河东张自忠军后路。黄维纲师撤回沂河西岸迎敌。

16 日，日军又调集 4000 余人由汤佛崖渡河，向第五十九军阵地猛攻，敌机 10 余架狂轰滥炸，我军伤亡虽重，但仍然坚守阵地。是日，夜 10 时到 17 日晨，日军全力攻击崖头、刘家湖、茶叶山阵地，守军阵地均被密集的炮火摧毁，日军占领该三处阵地。张自忠急令两个旅增援，奋力反攻，肉搏多次，阵地几度易手，终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日军大部被歼。张军乘胜全线出击，日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横尸遍野。同日，庞军团也发起攻势，激战一昼夜，先后占领尤家庄、傅家屯、东西水湖崖、沙岭一线，日军退守李家五湖、傅家池、草坡一带。经过三天血战，日军完全被击溃，残敌大部向莒县窜逃，一部仍在汤头固守待援。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约伤亡 3000 余人，日军亦被歼灭 3000 人左右，其中包括第十一联队长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和一名大队长。日军用载重汽车拉回莒县焚化的尸体就达 100 余车，来不及运回就地掩埋者还有七八百具。

正当张、庞两军要围歼汤头日军之时，第五战区忽令第五十九军立即调往费县。仅留一个旅在临沂。20 日夜，张军主力全部西撤。而在此同时，日军增援部队 3000 余人，向庞炳勋部队反攻，猛烈的炮火昼夜不停，庞军孤军奋战不支，退至桃园、石埠岭、黄山一线阵地死守。这时庞军兵力仅存 2000 余人，临沂再度告急。23 日，已到达费县附近的张军又奉命回师，24 日晨抵达临沂附近。次日，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以三个团夜袭桃园、三官庙，并攻克桃园。26 日，日军一部 4000 余人渡过沂河西进；另一部也到达临沂西，准备环攻临沂县城。张自忠急派主力于城西北之王家岔河、八里屯、小岭、古城一线布防拒敌。尽管日军连续三天以飞机往复轰炸，大炮猛烈射击，但由于张军将士前仆后继，奋勇御敌，日军遗尸满地，始终未能越过临沂半步。不久，因台儿庄方面日军战况吃紧，29 日夜，日军抽出坂本旅团主力二个步兵联队，一个野炮联队驰援台儿庄，仅留一部在义堂集附近与中国军队对峙，等待援军。

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突进到台儿庄的濑谷旅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全歼这支敌军创造了条件。

津浦正面日军第十师团自 1 月上旬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一线后，非常轻狂，认为当面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攻占徐州易如反掌，便沿津浦铁路向南突进。

为了拖住日军南下速度，使中国援军能够有时间在徐州附近部署，2 月 7 日，李宗仁令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孙桐萱率该集团军反攻济宁、汶上。济宁驻有日军 3000 余人，炮 20 余门，战车 10 余辆，日军每日以 1000 余人出城四处逡巡，防备甚严；汶上之敌约 500 余，炮 6 门，机枪 10 余挺，分驻城关戒备。

12 日夜，我军由开河镇渡过运河。次日零时，部队分由汶上城西北，东、南三面攀登城垣，实行偷袭。其中一部由城西北冲入汶上城内，同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日军由济宁派兵 800 人增援，在汶上城南辛店遭到我军一个团阻截。14 日，日军增援已达 1000 人。汶上城内日军机关枪、平射炮架于屋顶，向中国攻击部队猛射，并利用工事阻截各巷口，顽强抵抗，敌机数架亦反复

轰炸。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重。至 17 日晨，敌军由泰安、兖州、宁阳调来 2000 多人的援军，由于同汶上之敌激战、肉搏四昼夜，数次浴血登城，官兵伤亡达 2000 余，共毙敌七八百，奉命向开河镇附近运河之线撤退修整。

在反攻汶上的同时，孙桐萱命令第五十五军及第二十二师向济宁攻击。12 日晚，由济宁西北大长沟强渡运河，第二天早晨攻克北关。13 日午，我军从南面河长口向济宁反攻。15 日，敌 1500 人，炮 8 门，装甲车 20 余辆，分由泰安、宁阳、兖州来援济宁，企图断绝中国军队退路。师长谷良民派两个团分别在戴五屯、二十里铺迎击敌军。同日，各师长命令敢死队，冲入济宁城。至傍晚，谷师伤亡已达五六百人，更因腹背受敌，乃乘夜撤至肖王庄附近，日军 700 余人出城追击。

鉴于日军主力全面反攻，中国军队伤亡较重，攻势无进展，19 日，孙桐萱命令全线撤退。25 日嘉祥陷入敌手，第三集团军主力撤至万福河南岸。在这场阻击战役中，第三集团军一雪前耻，歼敌 1000 余人，击毁装甲车 5 辆，缴获大炮 4 门，战车 3 辆，该军也伤亡三四千人。济宁、汶上反攻虽未成功，却吸引了第十师团一个旅团主力，有力支持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

为配合第三集团军反攻济宁、汶上，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从 2 月 14 日起对日军发动牵制进攻。但因该集团军装备陈旧，武器低劣，都未获战果，只好撤至两下店以南阵地同敌对峙。日军在济宁战斗结束后，积极增援邹县方面。配合濑谷旅团沿津浦路南下。

3 月 14 日拂晓，日军第三十三旅团长濑谷启率步、炮兵各四个半大队，以及装甲车、辎重部队约 3 万人，在飞机掩护下，兵分四路向界河进攻。一部 3000 余人，由石墙攻陷王士俊第一二四师大小山、季寨阵地，从西路包围界河；一部 3000 余人自香城出发，由龙山、普阳山之间向界河突进，并包围了龙山陈离第一二七师阵地；界河正面日军三千余攻占黄家山阵地，守军一连全部牺牲，另一股日军 3000 余绕过龙山直扑滕县。15 日，日军连陷界河、龙山，并向滕县以北第一二二师一个旅猛攻。同时，日军一部已抵达滕县附近。孙震急令第一二二师长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的增援。其时滕县守军仅有两个营，王铭章急令第三六六旅由太平邑赶赴滕县增援，但该旅在城头村附近同日军数千遭遇，被截成数段，仅一个营冲进滕县。

16 日晨，日军步骑约 5000 人逼近滕县东郊，以重炮 8 门向东关猛轰，敌机亦向滕县投掷炸弹，守军东郊工事被炸毁数处。同时，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乘机向城垣猛攻，守军官兵与敌奋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但伤亡奇重。这一天夜里，王铭章将北沙河的两营调回滕县城。孙震鉴于滕县守军兵力单薄，要求汤恩伯军团的第四师带解滕县之围。但该师一个团在滕县东南关受阻。

17 日凌晨，日军又增加重炮 8 门，坦克数十辆，分由城东、城南同时进攻，炮弹密如急雨，东城墙被轰毁数处，南城墙被打破一两丈宽的缺口，城厢民房也被炮火化为灰烬。守军堵塞缺口时伤亡惨重。王铭章及各旅、团长分途率部堵击日军。王铭章并致电孙震，表示要视死守住阵地，用生命报效国家。下午，南城缺口被敌炮火越轰越大，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蜂涌冲入城内十多次，均被守军奋勇击退。不久，日军又集中炮火猛轰，城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敌数百人乘机占领了西、南两门，并凭高射击。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巷战。王铭章在西城督战，腰部中弹后，仍毙敌 3 名，壮烈殉国。

其余第一二二师参谋长越谓滨、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团长王麟均于城破之顷，督部血战，以身殉国。18日凌晨，滕县陷落，守军仅第一二四师副师长税梯青率数百人由北门突出，其余2000余人全部牺牲，滕县虽失守，但王铭章部坚守两昼夜，为汤恩伯孙震两部在台儿庄一线部署作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如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又可北上策应板垣师团，断张自忠、庞炳勋各军的后路。

在进攻滕县的时候，日军濑谷支队主力已于17日攻陷临城，18日又分兵两路，直扑韩庄、峄县。此时，汤恩伯军团奉命从河南归德和安徽亳县驰援滕、临，由于路途遥远，仅有先头部队到达滕、临、峄地区。日军凭着炮、空和机械化部队协同的威力，很快攻陷枣庄、韩庄、峄县。守峄县的第二十军团王仲廉第八十五军一个团伤亡其重，团长阵亡。敌攻下韩庄后，其步兵四五百，坦克10余辆，企图渡过运河，直捣徐洲，但因汤军团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郑洞国师已在韩庄附近运河南岸布防，同日军隔河激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日军主力向东转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其时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主力已由郑州、洛阳赶赴台儿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附炮兵一营先期到达台儿庄布防。汤军团主力也已渡过运河，在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准备于3月24日侧击枣、峄之日军，将其压迫到微山湖畔歼灭。

23日，峄县日军1000余人，在重炮10门、坦克8辆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进攻，被第三十一师与第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残敌300余人窜到北洛固守。第二天，日军2000余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其一部突入庄内，池师以一旅在庄内展开巷战，另以一团从背面攻击敌军，终将日军击溃，并克复刘家湖。下午，日军再由北洛反攻，炮火将台儿庄北门轰破，日军300人冲入，被池师歼灭。25日黎明，汤军团以两个军向峰、枣之日军发动攻击。关军在枣庄东南将日军派往临沂支援坂本旅团的沂州支队包围击破。同时，王军陈大庆第四师于24日午夜从三面围攻枣庄，并于次日攻入城西，焚烧敌战车8辆，日军约一个联队据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顽抗。同日，日军炮火轰毁台儿庄北门及西北门寨墙，敌200余人突入庄内碉楼躲藏起来。

到26日，日军进攻台儿庄部队已达3000余人，并补充了重炮、坦克和弹药。同日，中国野战重炮团及战车防御炮营，铁甲车一个中队先后开到台儿庄，中国守队火力大大加强。27日，日军在9辆战车的掩护下，猛攻台儿庄，突破北门，占领东北角。中国战防炮神威大显，击毁敌战车6辆。从28日起，敌我在台儿庄、刘家湖附近激战。日军飞机、大炮昼夜轰炸，台儿庄车站、煤厂几乎成一片废墟。第二集团军与日军进行近战、肉搏战，使日军战车、大炮失去威力，打退日军无数次进攻。当晚，日军300余人由城西破口冲入西北角，联合该处顽抗之敌向中国军队突击，但遭到中国守军炮击，战至深夜，将入侵之敌大部消灭，其一部退据大庙死守。池师亦伤500余人。

鉴于台儿庄方面战况紧急，第五战区于27日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主力向南转进，先歼灭台儿庄之敌。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汤恩伯仗着是蒋介石的嫡系，竟公然对抗李宗仁快速包抄台儿庄敌军的命令，停在敌后山区徘徊不前。李宗仁勃然大怒，说如果再不听军令，贻误战机，定按蒋介石杀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恩伯此时也



知“县官不如现管”，李宗仁说得出做得到，连夜率全军南下，于4月3日抵达台儿庄近郊。此时台儿庄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城三分之二已为敌有；东边的板垣师团也赶到附近，已能听到东线隆隆炮声，台儿庄万分危急。

台儿庄守军此时仅据守南关一隅，死拚不退。矾谷心中十分焦急，调集重炮、坦克猛轰猛冲，志在必克；同时致电板垣，恳求尽快向台儿庄靠拢；为了扰乱中国军队军心，还用电台广播宣称已将台儿庄全部占领。

孙连仲部队伤亡过大，通过电话向李宗仁哀告：“我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可否暂时撤退，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呀！”

作为杂牌军首领的李宗仁对孙连仲的处境十分同情，对嫡系汤恩伯的行为非常愤怒，但他知道，此时放弃台儿庄，必然功亏一篑，只好忍痛严令孙连仲防守。孙连仲含泪答道：“好罢，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他对守城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将士们上下都抱定了不再生还的决心。

当天午夜，孙连仲、池峰城组织的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反击，手持大刀冲入敌阵。抗日将士人自为战，在黑夜里奋勇砍杀，骁勇异常。矾谷师团血战数日，也已精疲力竭，完全没有料到残存的守军还能组织攻势，仓皇应战，一时乱成一团。守军激战半夜，竟一举夺回台儿庄市街的四分之三，毙敌无数。日寇只好退守北门，拚死据守。

汤恩伯军连夜进军，由太平山、傅山、青山一带南进，协同孙连仲部夹击台儿庄附近之敌；王军主力则集结在神山一带，并留一部占领卓山、黄山、马山一带高地掩护关军侧背。

台儿庄方面，29日战事最激烈。池师对庄内日军实行反攻，一支72人的突击队，在迫击炮掩护下，攻击文昌阁，将盘踞其内的日军悉数聚歼。又对台儿庄北面之日军实施反击，攻克了邵庄、园上、孟庄，击毁敌坦克两辆。陈金照第三十师向南洛、三里庄挺进，截断日军后路，并给日军增援部队以重创。敌在援军到达后，即行反攻，又夺取台儿庄东半部，在庄内与池师相持。30日上午，第三十一师向西北角日军反攻，与敌肉搏数小时，三十一师阵亡300余。日军企图从顿庄闸附近渡河，由西边包抄台儿庄，但被击退。同日晚，关麟征军占领台儿庄以北之林庄，猛攻日军侧背，日军腹背受敌，乃将正面兵力转至东侧，猛攻关军，激战一昼夜，至31日下午，关军已占领兰城店、小集等据点和獐山、天柱山，其主力迫近南洛、北洛，濛谷旅团被团团包围。

正当孙、汤两军要发动攻势围歼该股日军时，由临沂转来的坂本旅团主力，于4月1日，从东面侧击关军。我军以一部阻敌，主力迂回攻击坂本旅团侧背，坂本急于解濛谷之围，留1000余人在洪山镇附近抵抗，主力向台儿庄右翼突进，又进入中国军队包围圈。

台儿庄方面，4月1日夜，黄樵松第二十七师800余人攀登寨墙突入东北角，袭击日军，敌仓惶失措，被击毙许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隅及东门以北几座碉楼。2日夜，我军250人组成奋勇队突入庄西北角，进行夜袭，日军仓促应战，被毙斩甚多，中国军队夺回西北角。双方在庄内展开激烈争夺，但由于日军坂本支队加入战斗，第二集团军伤亡又重达7000余人，因而陷入苦战，台儿庄四分之三落入敌手。

第三集团军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已渡过微山湖，由南阳桥一带越过运

河，收复两下店、界河，将日军后援切断。

为此，第五战区决定迅速围歼濂谷、坂本这两个旅团。4月2日下达总攻击令，3日，各兵团按作战命令发动总攻。关军于4日肃清兰陵、洪山镇日军残部，5日南下，抵达台儿庄东北，向日军发动猛攻。王仲廉军3日由大良壁东进，4日于陈瓦房附近重创坂本部队，5日追击该股日军至台儿庄东北15公里之潭庄附近。周岩第七十五军3日由岔河镇击败肖庄之敌，5日向台儿庄东7公里之东庄攻击。日军为挽回败局，以大炮数十门，战车数十辆，向周、王两军阵地猛轰。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终突入台儿庄正面的张楼，从腹背击敌，日军阵脚大乱。在台儿庄，第三十一师官兵展开巷战，用大刀奋力砍杀敌军，逐段肃清庄内之敌。第三十、第二十七师又攻过运河——一师则渡河夺回黄村、赵村试图断敌退路。6日，第三十师攻下南路，第二十七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反攻，日军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去。第三十一师也向庄内日军大举反攻，濂谷部队力战不支，于当天夜首先脱离战场，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支队仍在寨内顽抗，但在中国军队夹击下，已伤亡惨重，加以后援被切断，乃于当夜烧毁弹药，突出台儿庄，也向北溃败。溃败的日军沿台枣支线退至峄县、郭里集、枣庄附近。

4月14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第二十军团转入守势，仅在獐山一线布置攻击。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则转入防御。台儿庄战役最后一战宣告结束。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中一次著名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进行的一次胜利的战役决战。在会战初期，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曾通过受命去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指导：“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宗仁掌握了日军的战略动向，乘骄狂之敌孤军轻进之际，采取防御中的进攻行动，守点打援，将日军主力阻挡和包围在台儿庄及临沂地区，并给以重创。

台儿庄战役前后近一个月，日军凭借其兵器优越，炮火猛烈，不断向台儿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步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以伤亡近2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万余人，击毁战车10余辆，野重炮10余门，取得了抗战以来我国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但是，从总的形势看，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的。这除了中国经济、军事力量太弱这个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国民党不依靠人民而采取单独防御的方针，使军队处处被动挨打，加之指挥混乱，内部派系矛盾又多，所以付出代价极高，而结果是全线溃败。到1938年10月，北平、天津、太原、济南、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相继陷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国土落入敌手。蒋介石只好把政府迁到四川山城重庆。

## 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陆续开始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大决战。这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辉煌的胜利。其中威武雄壮的激战场面和解放军英勇的表现，令人难忘。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国民党军队实行反攻，取得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攻坚战的胜利。许多重要城镇象石家庄、洛阳等相继解放。解放区已经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人民解放军也从120万人增到280万。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也空前高涨，蒋介石政权已陷于空前的孤立，经济已完全崩溃。这个状况表明，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彻底打倒它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形势，决定集中兵力，在东北、华北和华中组织战役，解放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

战役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64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有较强战斗力的只有174万余人，且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用于后方守备的近24万人。国民党军队总数量和正规军的技术装备虽仍占优势，但由于其多数受过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内部矛盾更加尖锐。整个国民党营垒中，充满着严重的失败情绪。

为了挽救败局，国民党于1948年上旬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的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为此，蒋介石开始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二线兵团的编组训练，准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同国民党情况相反，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作战，兵力已经优于敌人。部队的技术装备有了极大的改善，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炮兵与工兵部队，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提高了大兵团作战和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能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指战员普遍提高了阶级觉悟，军心振奋，士气高涨，军政素质有了更大的提高。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并组成了华北人民政府，东北地区已有98%以上的地区获得解放，西北和华东解放区基本恢复，中原新解放区也日渐巩固，解放区内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前，解放区工农业生产也有发展，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比以前更加雄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

当时全国的基本形势表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毅然地发动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选定在东北战场。

当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有卫立煌集团辖4个兵团，共14个军44个师55万人。他们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于长春、锦州、沈阳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8个军24个师30万人，防守沈阳地区，以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共10万人，防守长春孤城，企图牵制人民解放军主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4个军14个师15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

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国民党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

东北人民解放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占相当大的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98%以上的土地，86%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95%的铁路线。

为了全歼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东北，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州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地，不仅割裂了关内敌人和关外敌人的联系，便于人民解放军把卫立煌集团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国民党军队出援，造成打运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

但是毛泽东的计划并未马上得到实施，在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中央发生分歧，林彪主张先打长春，认为它好打；而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打锦州更为有利，拿下锦州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使敌人无法逃窜。林彪坚持已见去打长春，结果伤亡很大，只好停止。后来在政委罗荣桓等人的坚持下，他才接受按中央意图南下攻打锦州。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野战军发起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兵团，使其无暇东顾，抽不出军队支援东北战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9月10日南下北宁路，以6个纵队零4个师指向锦州，对付范汉杰兵团；以5个纵队对付沈阳之敌，并阻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继续包围长春之敌，并佯装攻城以迷惑敌人。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在义县至唐山段38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强大的攻击。12日夜突然包围了兴城、沙后所、绥中之敌。14日锦西国民党军向兴城增援，但遭人民解放军顽强的阻击，未能得逞。热河骑兵师于14日在唐山以东铁路线上进行了追击战，切断了兴城至唐山间的铁路交通。

东北野战军第四、九纵队12日插入义县、锦州之间，第四纵队随即包围了义县国民党军。24日夜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渗透战法，直插敌锦州外围诸阵地，将敌分割数块，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占领若干阵地。

国民党为了夺回已失去的锦州外围阵地，于25日集中其主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解放军已占领的白老虎屯、亮马山一线阵地实施疯狂的反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无比的英勇顽强精神，与敌展开了搏斗，守住了阵地，同时肃清了锦州以北国民党军占领的重要外围据点，歼敌4000余人。

眼看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24日，严令卫立煌“破釜沉舟”向新立屯、彰武攻击，以策应锦州的防御，并令沈阳国民党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加强防御力量。当天，国民党四十九军即开始空运，由于解放军以猛烈炮火击毁敌机数架，封锁敌机场，空运被迫中断。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从左翼迂回到锦州西南地区，切断了锦州至锦西的交通。第九纵队于28、29日攻占了绥中和兴城，歼敌6000余人。10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义县发起了攻击，经4小时的战斗，国民党九十三

军万余人全部被歼。至此，山海关至义县的辽西走廊，除锦州、锦西两孤立点外，其余均为解放军占领，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锦州国民党军被围后，蒋介石极为恐慌。10月2日，他由北平飞抵沈阳，亲自督促东北作战，决定从两面援救锦州：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首先攻占彰武、新立屯，截断人民解放军攻锦部队后方的铁路交通，解除锦州之围，同时策应长春国民党守军的突围。另从华北及山东抽调7个师，连同锦西、葫芦岛的4个师，共计11个师的兵力，由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企图东西对进，增援锦州。令长春郑洞国第一兵团，相机突围南下。锦州国民党军队根据上述总计划，随即以现有兵力10万余人，凭借锦州四周环山的险要地势，继续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固守待援。

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的指示，决定增调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由辽西南下，参加攻锦作战。人民解放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并进行了完善的组织，给锦州敌军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成为“瓮中之鳖”。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攻城部队在进行了一小时的炮轰之后，从北、西、南三面攻向锦州城，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然后，一鼓作气冲进市内，展开了激烈巷战，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攻占了锦州，全歼守敌10万余人，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陆上的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塔山地区阻击部队，英勇顽强，经过6昼夜的苦战，歼敌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国民党军队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的绝望形势，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2.6万余人起义，撤出长春。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投降，长春遂告解放。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严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西、葫芦岛地区之敌继续东西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以便让剩下的军队经由陆路或海上撤逃。这时，东北野战军不打锦州和葫芦岛，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同时东北野战军堵塞敌人海上退路。21日，东北野战军除留两个纵队在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围歼廖耀湘兵团，并以第五、六两个纵队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敌退路。21日又令第十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解放军主力插至廖耀湘兵团后方，围歼该敌。至25日，国民党军在黑山、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解放军独立二师阻击，误认为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26日，东北野战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至28日，即将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主力被歼灭之后，沈阳城立即人心大乱。“剿总”司令卫立煌对部下说：“仗没什么打头了，你们各自找出路吧！”然后，他坐上飞机先走了。在飞机上，他看见解放军已经渡过辽河，沈阳眼看就要失守，又急忙飞回来，想多带走几个亲信。飞机一落地，官员们你推我挤，争着先上飞机。有个官员登着吉普车顶往飞机上爬，被人一脚踢了下去，机上机下乱成一团。

当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向沈阳、营口急进。11月1日，人民解放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时，营口之国民党军除万余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解放军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个师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兵力下降为290万左右，人民解放军上升为30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这就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的崩溃，奠定了迅速解放全中国的军事上的巩固基础。毛泽东高兴地说：原来我们预料五年打倒蒋介石，现在看来只需要一年左右就可以做到了。

淮海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华中广阔原野上进行的。双方都在这里集结了主力部队，规模之大是三大战役之最。蒋介石想在这里阻止解放军南进，派了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布阵，刘峙、杜聿明坐阵指挥，黄伯韬、邱清泉、李弥、孔元良、李延年等兵团分别把守徐州四周各点，总兵力有80万人。中共中央为在这里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防止它南逃，也派出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华东野战军，还从华东、中原、华北各地方部队调来援军，总兵力有60多万。

国民党把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战役开始前，国民党军在中原、华东地区共聚集约150万人，分别隶属于华中“剿总”白崇禧和徐州“剿总”刘峙指挥。白崇禧集团70万人，分布在平汉路南段和长江宜昌至芜湖一线；刘峙集团约70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铁路两线。国民党妄图阻击人民解放军南下，确保其统治中心南京及长江以南统治地区的安全。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曹八集、临城、沐阳等地；第二阶段为“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原和华东两个野战军的统一领导机关——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邓小平任前委书记。

整个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战役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8年11月6日起至同月22日止，解放军在碾庄圩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七兵团黄伯韬部，并孤立了徐州。

遵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中原野战军即在河南南部引黄维、张淦两兵团向西，并以一部主力协同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徐州以西迷惑敌人；又以一部主力占领宿县，并在蒙城地区完成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华东野战军，从山东境内分路南下，横扫陇海路北侧150公里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阵地。东路部队首先于11月8日攻克郟城，歼敌5000余人。中路部队沿津浦线向南猛进，直插徐州东侧。原防守陇海路东段之黄伯韬兵团，不敢应战，连夜向徐州逃窜。解放军各路大军跟踪急追，将逃窜之敌打得稀烂，3天中间即追歼各部逃敌近2万人。在追击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排除障碍，战胜困难，忍饥耐寒，日夜兼程，迅速涉过运河，追上敌人。9日，黄伯韬

率4个军刚逃到运河西岸，又遭到人民解放军的迎头堵击。黄伯韬走头无路，又折回碾庄、曹八集地区，立即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黄伯韬被围后，蒋介石令其就地固守待援；同时令驻徐州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拚全力东向解围。另调孙元良兵团进入徐州。又令黄维兵团向蒙城、宿县急进；并调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协助刘峙指挥，妄图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针对战场的情况变化，11月14日，毛泽东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歼灭黄伯韬，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刘汝明部。遵照这些指示，华东野战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以5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以3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7个纵队从徐州东南钳制徐州之敌。

16日起，华东野战军主攻集团对黄伯韬兵团展开猛烈攻击，各路纵队充分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接近敌人，插入各村敌人之间，进行逐点逐村夺取，逐个歼灭。战斗到19日，碾庄外围村庄的敌人即大部肃清。当日晚人民解放军便对黄伯韬兵团部所在地的碾庄发起总攻。战士们冒着敌人火力封锁，奋不顾身，涉过深及腰际的冰冷河水，突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激战至22日黄昏，围守碾庄的敌人完全被肃清。至此，黄伯韬所指挥下的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

当解放军在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时，国民党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共12个师，另有部分装甲部队，急速由徐州向东增援，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人民解放军猛烈攻击。但是，他们都遭到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抗击。经10昼夜激战，国民党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只前进了15余公里，离碾庄还有20多公里，眼看着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而无可奈何。

战役第一阶段，人民解放军获得歼敌18个整师，共17.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就给以后歼灭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第二阶段，自1948年11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15日止，解放军在蒙城、双堆集地区，全歼国民党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在孟集以西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并合围了杜聿明集团。

当人民解放军正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和徐州被包围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河南南部调遣黄维兵团赶来增援。黄维带领12万人马，日夜兼程，拚命赶进，一路上连遭解放军阻击。11月24日刚到浍河南岸，就陷入解放军早就预备好了的天罗地网。解放军主动放弃了浍河沿岸的南平集，撤向南平集东北地区，布置了一个袋形阵地，采用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来消灭黄维兵团。黄维当时发觉不对头，准备掉头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很快被中原野战军紧紧包围在双堆集一带。27日，黄维调动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企图向南突围，结果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部5000多人，乘机举行战场起义。其余的部队，在人民解放军猛烈打击下，缩了回去。

黄维兵团被围之后，曾在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之下，几次妄想依靠其优势装备突出重围，但都碰得头破血流。至11月29日，解放军便将包围之敌压缩到方圆10多里的地区以内。包围圈里的敌人，内缺粮草，外缺援兵，官兵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

12月1日，蒋介石急忙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20几万人向徐州西南地区突围，企图与李延年兵团南北对进，协力与黄维兵团会师。可是杜聿明的3个兵团刚一离开徐州，即遭到华东野战

军数路大军的追击，从12月3日起，走了整整13天，遭到人民解放军重大杀伤，前进不到25公里，离黄维兵团被围地区还有30多公里。

12月6日，人民解放军东、南、西三个集团，同时发起总攻击。黄维兵团被围的双堆集地区，地形开阔，解放军很不易接近敌人。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创造了壕沟战术，挖交通壕接近敌人的工事。整个战场上，无数蛇形的交通沟纵横交错，一条条伸进围歼圈里。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发出了《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向黄维指出：“你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立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间紧迫，望即决策。”但黄维执迷不悟，拒绝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遂发起总攻。经过几次激烈战斗，于12月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终于全部被歼灭。同时，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壁，使淮河以北全境均获解放。黄维兵团的被歼，砍掉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又一根有力支柱，使徐州残余的敌人军心更加动摇，大大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第三阶段，自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止，解放军全歼杜聿明亲自率领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及直属部队等，共25万多人。

黄维兵团被歼后，李延年兵团回窜蚌埠，杜聿明集团自12月4日被围困在永城东北地区，丧失了孙元良兵团的主力之后，至15日，曾数次试图突围，但都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痛击而完全失败。杜聿明集团完全陷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

为了配合华北战场对傅作义集团实施“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平津的战略行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令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全军进行战场休整，并向杜、邱、李继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

人民解放军经过20天的战场休整，士气更加高涨，粮弹更为充足，为总攻作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向杜聿明等发出敦促投降书，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被围困的国民党军，由于连日大雪，气温降低，空投减少，增援无望，陷入了弹尽粮绝之境地。

在平津之敌已被解放军包围，杜聿明拒绝投降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调整了部署，于1949年1月6日16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各部队争先恐后，奋勇杀敌，大胆穿插分割，迅速突入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阵地。7日，解放军乘胜猛攻，尽管敌人在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连续施放毒气，也无法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20余万敌人全部就歼。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李弥逃脱。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全歼国民党精锐部队5个兵团22个军约55.5万人，另外还击退了两个兵团的增援部队。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杜聿明被俘，被歼灭的国民党5个兵团司令中，有两个战死，两个化装逃跑，一个被俘。解放了长江以北豫皖苏的大部分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上海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构成了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利态势，迫使蒋介石宣告引退，而南京国民党政权也随之陷入土崩瓦解的危局。

淮海战役是国共双方决定全局胜负的一个规模最大的战役。这个战役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援。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战争的胜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胜利，他们不惜献出一切。



在整个战役期间，华东、中原和华北等区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送粮食，运弹药，抬担架，救护伤病员，做出了难以计数的保障工作。据统计支援前线的民工共有 220 余万人，运送的粮食达 4.3 亿多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确地集中前线指挥员的集体智慧，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制定了科学的作战方针，运用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当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之中，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战役也开始了。

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这一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的兵力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 100 余万人。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统一指挥下，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最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任务。

1948 年 11 月，由华北“剿总”傅作义所指挥的 4 个兵团、12 个军共 60 余万人，在华北野战军的牵制和打击下，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由于美国、蒋介石、傅作义各有打算，因而对平津是守是撤，是南逃还是西窜，陷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美国不愿放弃侵华利益，企图以直接援助傅作义固守平津牵制人民解放军，以掩护蒋介石在江南重整军力。蒋介石企图诱使傅作义南撤，以加强江南防御。傅作义为自身利益计，企图西撤以保存实力，求得东山再起。经过美、蒋、傅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确定：坚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兵力的方针。傅作义在东起唐山、中经平津、西至归绥的千里战线上摆出一条长蛇阵，以傅之嫡系控制通往绥远的退路，以便在不利时西逃；以蒋之嫡系控制北宁线，保持联接海上通道，在不利时从海上南逃。

在这种形势下，敌人的南逃或西撤，都对解放全国的战局不利。为此，毛泽东对平津战役提出预定方针：把敌人留在平津地区，切断敌人南逃西窜之路，不让敌人收缩和集中，将各点之敌以分割包围，尔后各个歼灭。根据这一方针，1948 年 11 月 18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待休整，立即迅速隐蔽入关。11 月 20 日，又指示东北野战军不要走有敌人一个军防守的山海关，而取道热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自 11 月 22 日起先后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分几路星夜秘密入关。为统一作战指挥，1949 年 1 月 10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

平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 194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0 日，完成对平、津、张敌人的分割包围。

平绥路是傅作义嫡系逃往绥远的唯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其重要军事基地。

遵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11 月 29 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首先向张家口周围之敌发起攻击，12 月 1 日，切断了张家口与宣化之敌的联系，卡住傅系部队西窜的咽喉。傅作义即令北平附近嫡系“王牌”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企图保持西退之路。这样战役一开始就把傅系主力吸引到平张线上。12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以主力向怀来、延庆急进。使傅作义大为震惊，深感北平受到威胁，遂急令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令第十三军放弃怀来、

顺义撤到通县，令第一零一军撤至芦沟桥，令天津附近的第九十二军及驻廊坊的九十四军聚集北平，以加强防守。至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一部被歼灭，余部被分割、包围在平绥路东段，使敌既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斩断其长蛇阵。

平绥线被切断后，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依然存在，而敌人已有 10 艘军舰在海上待令。为此，毛泽东指令北平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切断平津两地的联系；令东北野战军 6 个纵队迅速向平、津、塘之间挺进，包围丰台、天津、塘沽、芦台诸点。为了稳住敌人，令平津前线解放军，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为了防止平津之敌向青岛逃跑，又令山东军区集中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

根据上述指示，东北野战军自 12 月 12 日到 17 日，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并击退敌人的反扑，先后占领廊坊等地，从而割断了平、津之敌的联系，割断津、塘两地之敌的联系，最后封闭敌之南逃道路。至此，人民解放军除歼敌 5.5 万余人外，已完成对新保安、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 5 个孤立之敌的分割包围，为以后各个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阶段，从 1948 年 12 月 21 日至 1949 年 1 月 15 日，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对新、张、平、津、塘诸敌的分割包围后，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规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次序，第一步先打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第二步歼灭天津之敌，最后夹击北平之敌。

张家口、新保安之敌被歼，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平张线全部为解放军所控制，使其西窜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平绥线上的战斗胜利结束后，华北野战军更加严密地包围北平。

天津守敌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八十六、第六十二、第九十四军 9 个师及地方团队共 13 万余人，归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指挥。敌人为顽守天津，从 1947 年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和物力，用 250 亿元的巨款，构筑长达 42 公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并挖一道宽 5 米，深 3 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 7 米，墙内每隔 30 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 380 多个，连同市内的碉堡先后共构筑 1000 多个。护城河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水深保持二三百米左右。另外，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敌人利用市内坚固建筑组成许多核心阵地，易守难攻。人民解放军针对天津敌人的守备特点和地形，对天津的攻击部署是：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包围，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在人民解放军部署攻城的前夕，陈长捷曾两次派人来谈判，以拖延战局。1 月 12 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天津守敌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如果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破城之日，将加倍惩罚，并限令在 24 小时内答复。而天津守敌却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投降。这样，1949 年 1 月 14 日 10 时，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 29 个小时的激战，至 15 日下午 2 时左右，打破敌人数十次的反扑，终于全歼守敌 13 万余人，活捉陈长捷，天津宣告解放。当解放军战士冲进市区，冲进防守司令陈长捷的地下室时，他还正给上司傅作义打电话汇报战况呢！

天津解放之后，塘沽守敌 5 万余人，见大势已去，于 16 日乘舰由海上南

逃。17日塘沽解放。至此，傅作义想从海上撤退之路也被完全切断。

第三阶段，从1月16日至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开始后，为了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义曾派人同中共北平地下党以及人民解放军进行接触和谈判。1948年12月初，当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和塘沽之敌被分割包围之际，傅作义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联系，以试探中共对战局的态度。1949年1月初，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攻克，平津紧张，傅作义再次派张东荪出城到蓟县与解放军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反映了傅作义对起义仍是犹豫不决，为此，聂荣臻在接见张东荪时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而外，别无出路。希望张东荪回去以后，转告傅作义早下决心。1月15日，天津守敌全部被歼，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积极准备攻城”和“进行和平谈判”的指示，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20万守敌团团围住，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北平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保全古城文物不受破坏，以争取和平解放北平。1月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通牒。至此，傅作义才下决心率部起义，并派同中央有些接触的邓宝珊为全权代表和周北峰再度出城，与解放军商谈起义的具体条件，作出协议，双方都签了字。随后，人民解放军派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进城同傅作义谈判接管北平事宜。

在人民解放军和傅作义进行磋商和平解决北平之际，蒋介石曾先后派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以及蒋经国带其亲笔信来北平，加紧拉拢傅作义南撤。指使特务对奔走和平的人士施以恐怖手段。但是，蒋介石的这些反动行径，已经阻挡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趋势。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宣布接受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这样，北平城内20万军队按计划于22日至31日陆续向城外开拔，到指定地点集结，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实行改编。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持社会秩序。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雄伟的入城仪式。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精神抖擞，步列整齐，通过前门，向各主要街道前进。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大战役中，解放军不但歼灭、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官兵，还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美国支援的先进武器也在其中。解放军就用这些武装自己，壮大自己。无怪乎大家都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东北、华北大部和华中一部分地区，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再打下去，中国共产党将赢得战争的最后一胜利，连许多国民党人也不怀疑了。

